

冷戰 / 劃界的思想考掘：朝向解放政治

Archiving Cold War/Bordering:

Toward a Liberatory Politics

王智明*

Chih-Ming WANG

讓思想空間持續以辯證運動的方式進行，不斷針對意識形態的觀念劃分提出質疑，我們才有可能持續打破被神聖化與實體化的符號疆界，開始思考歷史過程中不斷發生變化以及重組的社會，以及如何介入才可能獲得根本平等的公共空間。

（劉紀蕙2020: 430）

劉紀蕙老師是文化研究領域的重要學者，也是我很敬重的前輩。她的研究，就我所知，向來遊走在精神分析與馬克思主義兩大傳統之中，主體形成與解放政治是她研究著述的兩大關切。然而，要確切定位與定義紀蕙老師的研究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一方面是因為她的研究不以特定的學科範圍或時段為限，例如政治哲學或中國現代史，另一方面她對特定問題的思考，也不從學科的內在理路出發，例如「臺灣文學史上的林亨泰」或是「歐陸思想中的莊子」這類的題目，而是藉林亨泰打開關乎臺灣文學史的重要議題、或以臺灣作家為例子，但不受其限的思考，如她在〈前衛的推離與淨化〉這篇文章裡所展現的，目的是指出個別作家的「異常」如何反映文學史的敘事暴力（劉紀蕙2000）；或是藉莊子的「虛空」指出法國思想的侷限以及「從知到不知」返身虛空的思考，以解放知識與政治的能量，這是她對畢來德（Jean François Billeter）的莊子論所做出的批判（劉紀蕙2020: ch8）。

投稿日期：2020年9月1日。接受刊登日期：2020年9月7日。

* 王智明，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副研究員、交通大學社文所合聘副教授。

聯絡方式：wchim@sinica.edu.tw。

airiti

換言之，劉紀蕙老師的特色主要呈現在兩個面向：一是在學科的邊界上拓境，鍛煉在學科傳統範疇之外解釋問題的能力，並且從事實的考查拔高到理論的層次；二是比較或是對話的思維慣性，不以既成的論述為真理，而總是要在跨文化、跨地域的語境中重新檢視、辯詰、調整與重構，一方面予之鬆動或相對化，另一方面加之補充與深化，在其斲折的細微之處展開尖銳的政治性反思。在這個意義上，邊界、或更精確地說是「劃界的政治」（the politics of bordering），是她最核心的關懷。這或許緣於她比較文學的訓練、或許來自文化研究的批判性格，也或許跟她長年進出中西思想與理論的耕耘相關。不論如何，在我看來，邊界或劃界是紀蕙老師思考的關鍵，也是解放政治的核心現場。如上述引言所示，如何打破符號疆界、思考歷史的變化，以及介入公共的形成以達致或重構平等，是思想的作用，也是她論著用力最深之處。這也是我理解和討論《一分為二》時，最根本的起點。

在近五百頁的篇幅裡，《一分為二》雖然分為四個部分，但我認為主要處理的是三組問題叢：（一）「一分為二」概念的考掘，尤其是它從革命到僵化的過程如何座落在（兩岸）冷戰的歷史時空當中（第一至三章），而對立政治在思想上的展現（第四至六章）可視為其例證；（二）作為政治性的詮釋及思想的運動，「一分為二」的觀念在歐陸當代思想家的理論著作中如何呈現，這裡的核心是一與多的變化，以及對空與無的詮釋（第七至九章）；（三）藉著空與無的討論，轉進國與法的思辨，借道章太炎的思想展開解放性批判政治的想像，亦即回到機制與治理的問題，從主體為一與空的這個角度，去批判劃界——不只是疆域的劃分，更是人口的納入和排除、欲望的接納和否定——的行動與重構生命的政治（第十至十二章）。換句話說，看似上下百年、橫貫東西的編排，其實是沿著相當一貫而縝密的邏輯展開的。若我們從後往前推，那麼這個邏輯的起點就是，國家治理為何需要或仰賴「劃界」行動，劃界行動又反映了什麼樣的體制構造與政治想像，這個「一分為二」的政治在思想上的理據何在，又經過什麼樣的哲學轉化？如果「一分為二」不只是「敵我之辨」的對立政治，那我們又該如何重新構思這個思想運動，使之從對立劃分的極端政治回復到更為活潑而基進的狀態，成為抵抗「同一」的基礎，使「一」成為

空、成爲多的集合？我想，這是她這本書最爲重要的問題意識，理論和歷史（不論東、西、今、古）只是她發展這個問題意識的借道，根本的關懷還在當下，在我們處身論世的島嶼上。

因此，我的回應——其實更是讀後心得——主要在三個論題上展開：一是冷戰作爲「一分爲二」的歷史模型，如何幫助我們面對主權邊界絕對化與神聖化的問題；二是劃界政治所涉及的「同一」與「多元」兩個傾向；三是方法論，特別是紀蕙老師借道阿岡本（Giorgio Agamben）發展出來的哲學考掘學。循此，我想特別提問的是：後冷戰或新冷戰的困局對「一分爲二」的哲學解釋有何影響，而思想工作又如何介入現實政治？同時，我也想在文化研究的脈絡中討論「哲學考掘學」的意義。

一、冷戰 / 劃界：對抗的形式

文化大革命，集中了20世紀現代政治在它的極端中所表現出的所有矛盾，我們還沒脫離它。它仍然是向不可能的政治領域開放著，同時也是一個場所，提示了它危險的悲劇性教訓。若群眾未能把自己打造成政治主體、並未具有變革結構的獨特展望，那麼，任何有意義的政治都不可能實現了。但是，在此同時，若沒有機器和批判去控制它奔馳向不可預測的非理性疆界、極端暴力的世界，那其政治也不可能維持下去，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訓。（白承旭2014: 231-232）

南韓學者白承旭對文化大革命的這番總結，或許可以作爲理解「一分爲二」徘徊在革命與僵化之界的入口。對白承旭來說，文革的意義不在於定性總結它爲失敗，而在於它展開了無法駕馭的政治，即革命在理想與實踐之間的矛盾。白承旭認爲，文革的成功在於動員群眾的能力，不僅是由上而下的動員，而是藉由運動激發群眾的能動性，轉而對革命情勢有自覺的參與，但也正因爲如此，文革的基進性對執政當局造成威脅，破壞了「政治」運作所需要的理性原則，淪爲極端的對立與暴力的宣洩，也因此群眾或人民只能是一個「名義」，無法成爲擁有能動性的政治主體。

文革亦是《一分爲二》的核心關切，不僅因爲在思想上它與毛澤東的〈矛盾論〉相關，更因爲1949年之後的冷戰情勢與政治運動具體展演了「一

分爲二」從革命而僵化的變化。矛盾論的核心原理是：「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」，變化的條件或許來自外部的影響，但「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…在於事物內部的矛盾性」（劉紀蕙2020: 66）。因此，「不同質的矛盾，要用不同質的方法來解決。研究中國革命，更要在不同矛盾的總體以及其內部各個方面相互聯結進行研究，分析其關係如何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，以何種方式進行具體鬥爭。」（ibid.: 67）這也是毛澤東後來提出「不斷革命論」的思想基礎。然而，紀蕙老師認爲，這個結合情勢、極爲動態的分析，在確認政治主體的問題上，卻面對三重的內在悖論：因階級矛盾所預設的階級劃分，因人民主體而產生的內外之別，以及因反官僚主義與黨國體制造成的國家主體何在（或是說黨與人民關係如何界定）的問題。這三者雖是不同的分析範疇，卻相互交織，尤其在爲了清楚定義政治主體的過程中，階級、人民與國家這三個範疇失去了矛盾論的動勢分析，逐漸淪爲靜態對立：在外表現爲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、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，在內呈現爲人民內部的矛盾以及官僚與人民的對立。因此，人民被階級穿透和固置，但階級的主導位置又有賴國家的保障；國家雖要承載和執行人民的意志，但人民的意志卻又不得不由黨來代表。人民與國家的溝通的互助原該透過黨，合二而一，卻最終演變爲一種代表制（黨代表了國家及人民，一分爲二），這就使得階級、人民與國家的界線愈發僵硬，黨的作用與地位亦發模糊，而革命所引發的動勢最終必須被收束到政權保衛戰的前提下。是故，紀蕙老師對1963-1964年的楊獻珍哲學事作，提出了如下的判斷：

楊獻珍的「綜合經濟基礎論」被批鬥爲是「妄圖保存和發展資本主義的反動謬論」，是反革命修正主義，反馬克思主義、思想的大毒草。思想的辯論轉變爲意識形態的階級鬥爭與路線鬥爭，被實體化與絕對化，並且成爲人身攻擊的合理標誌，這是「一分爲二」最爲粗糙的形式。「挖出」人民內部的一部分，將這一個不屬於我們的部分「分出去」，而塑造了一個新的社會身體，這是當時運動的主要訴求。（ibid.: 117）

「『挖出』人民內部的一部分」以塑造「新的社會身體」是此中的關鍵。它不只在內部發生，亦在外部進行，表現爲冷戰意識形態的對抗，以及始終未能完成的國共鬥爭，將南韓學者白樂晴（백낙청）所謂的「分斷體制」¹

1 詳見白樂晴（2010）。

固著下來，予以絕對化、實體化與神聖化。如此一來，「一分為二」的邏輯像病毒一般，不斷在內部複製與增生對立的形式，使我們無法看到對立的兩造本是相互生成的依存關係，尤其「因防衛性安全措施而進行鞏固主權與排除他者的各種禁令，逐漸使臺灣文化不斷片面化」（*ibid.*: 131）。

紀蕙老師的詮釋，有意將「一分為二」的邏輯從1937年毛澤東發表〈矛盾論〉的脈絡中挪開，²放入到兩岸冷戰的結構中，以批判愈形嚴重的主體邊界化，並展開邊界民主化的方案。她寫道：「邊界的民主化，正意味著要針對觀念所固定的邊界，分析這個劃分是如何被歷史性地構成的；只有開始進行歷史性以及現實物質條件的具體分析，才有可能開始化解這個僵化的對立結構。」（*ibid.*: 134）然而，若是回到〈矛盾論〉裡，我們會發現毛澤東強調的是：「對抗是矛盾鬥爭的一種形式，而不是矛盾鬥爭的一切形式。」對抗或許是必要的，但並不是所有的矛盾都適合或需要對抗的形式，同時，矛盾若沒有適當處理，最終也可能發展成對抗。換句話說，關鍵的是如何把握矛盾的質與量，予以化解或轉化，而非將矛盾等同於對抗，使得社會發展可以向前再進一步。因此，如果我們認真把握毛的說法，就會理解冷戰是一種對抗形式，它包含了多重的矛盾，而國共內戰只是其一。

但是，我們一旦以冷戰分斷的邊界或劃界為起點，反而容易忽略了其他同時存在於分斷體制的內部（如民主與獨裁）和外部（如地緣政治與帝國霸權）的矛盾，從而使得分斷的邊界——不論是臺灣海峽或是38度線——被自然化和固置化了。那麼，當邊界成為主要矛盾的時候，僅僅將之歷史化與民主化，而不同時考慮其他矛盾的制約效果（或是阿圖塞 [Louis Althusser] 所說的「多元決定」）是否有助於化解對立？進一步說，如果可以將兩岸分斷、一邊一國視為「一分為二」的歷史結果，而不是暫時形式，那麼僅僅致力於邊界的民主化（如促進臺灣或大陸的民主自由），而

2 當然，紀蕙老師在書中並不是沒有提到這個脈絡（見：劉紀蕙2020: 62-68），只是這部份的討論主要是為了理論的鋪陳，而不是將之放在歷史中解釋。也就是說，從1927年的寧漢分裂（清黨）起，毛澤東1937年的〈矛盾論〉，再到1940年的〈新民主主義〉，乃至1945年的〈論聯合政府〉和1949年的〈論人民民主專政〉，這之間的變化與邏輯的推演（共產黨由衰轉盛、結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的戰略、創造聯合政府的想法等等）有許多不同的面向。內戰邏輯中的矛盾，未必能夠等同於冷戰。

不同時考慮「合二而一」（兩岸統合）的命題，是否足以與被絕對化與神聖化的邊界對抗？以南北韓為對照，儘管兩韓仍然處於對抗之中，但對抗仍是作為統合進程中的暫時形式，而非其結果。南韓晚近關於北韓的電影與電視劇中，雖然對北韓的描繪仍多少保留了冷戰的意識形態，但總會強調兩韓人民情感與血脈的不可割裂。³雖然38度線仍然無法任意穿越，但兩韓合一的願望（起碼就影視的再現而言）仍是強烈的。但這似乎已是兩岸不再擁有的溫暖、或是不願想起的過去。當然，我沒有天真到以為統合就能解決一切問題，只是在想，失去了統合這條水平線的兩岸，如何能從「一分為二」走向「合二而一」的辯證？我們又該如何解釋「一分為二」在後冷戰時期的持續深化？是因為中美新冷戰的到來，還是因為「合二而一」的歷史條件仍未出現？如果可能的話，在新冷戰格局中的「合二而一」又會以什麼樣的形式出現？那麼，從劃界政治出發的「一分為二」思想運動，最終將如何回到與回應共同體邊界被神聖化與自然化的現實？

二、同一與多元：解放性的政治

當然，對紀蕙老師而言，劃界政治更重要的課題在於「民主化」，而民主化的核心關懷是解放性的政治。這也是她要繞道西方的歷史緣由，因為1960年代毛主義在歐陸思想界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，尤其影響了一代法國的知識分子，包括我們熟悉的阿圖塞、齊傑克（Slavoj Žižek）、洪席耶（Jacques Rancière）、巴迪烏（Alain Badiou）、巴里巴爾（Étienne Balibar）等人，相當程度造就了當代歐陸的思想圖景。大陸學者徐克飛（2018: 2）說，毛主義是近代史上中國走向世界的第三波浪潮，「深度參與了法國當代文化版圖的重構，促成了今天所說的後現代主義的思想大創造」。的確，紀蕙老師在第九章中詳細剖析了毛主義對上述歐陸思想家的影響，闡釋他們如何將「一分為二」轉換為「空」與「無」的政治性詮

3 這裡我想到的是2017年楊宇碩（양우석）導演的《鋼鐵雨》（《강철비》），2018年金秉祐（김병우）執導的《90分鐘末日倒數》（《PMC: 더 벙커》）和2019年TVN製播的電視劇《60天指定倖存者》（《60일, 지정생존자》）。

釋，以接連馬克思（Karl Marx）和佛洛伊德（Sigmund Freud）的思想傳統，提出解決當代社會難題的批判性方案。

在此，思考的核心不再是冷戰兩極的對抗形式，而是一與多的辯論，關鍵不在於邊界的絕對化和神聖化，而是治理邏輯與主體想像的「空位」與「虛構」。從阿岡本的「寶座空位」、阿圖塞的「切割機制」、洪席耶的「感知分享」、巴里巴爾的「邊界批判」而巴迪烏「解離與扭轉」，紀蕙老師試圖說明歐陸思想中的主體想像其實是一個治理機制，唯有當我們把個人主義式的獨一，放回到治理的語境當中，我們才能夠看到主體其實是話語效果，所謂的「一」只是一個空處，一個拓樸空間的折合：這個「一」既是權力集中之處（所謂的寶座），也是權力散射的方法（傅柯〔Michel Foucault〕意義上的全景監視），主體與治理的連繫之處正是政治經濟操作的場域，在封建時期展現為君主權威的無所不至，在民主時代則以民主機制所形成的「共識」作為治理的基礎。但不論是君主或「共識」，治理形式都是「一與多」的關係。是故，紀蕙老師強調：「如果我們可以意識到『虛空』聯繫著治理及神意的秘密神學連結，我們便可以朝向超越政府的思考，並且探索是否有種不必藉由經濟神學形式而存在的完整生命狀態。」（劉紀蕙2020: 287）換言之，解放性政治的前提在於理解治理本身總是「務虛」的，體認各種各樣的人民，而非整齊化一的主體，才是政治的實體。但是「人民」的再現總是有限的，勢必按照主導意識形態的要求而有所排除，這些被排除者即是語話和歷史的「缺口」，他們即是洪席耶口中無法分享主流社會感知結構的「無分之分」——那些穩定規範結構下無法命名與不可見的他者。也因此巴里巴爾的邊界批判與民主化想像實有必要，因為對吸納與排除原則進行討論和批判才是應對治理的方法，才能在「共識」的偏差中顯示數量與質量的「多元」，並以之為原則重構「共識」。這便是解離與扭轉的關鍵所在，以「偏差之名」「中斷原有的話語秩序，改變分配的秩序」（ibid.: 309），突顯共同體之虛妄，才是「共同」（the common）的支點。在這個意義上，偏差即是政治的構成，而扭轉才是政治的實踐。紀蕙老師寫道：「政治主體性便是各種脫離同一性結構的活動、展現偏離於常態共識的主體性經驗，中斷並挪動既有

秩序，使原本無分者得以出現、參與、言說。」（ibid.: 313）

但是這樣的解離與扭轉也帶有暴力的性質，因為這也是矛盾的運動，而各種各樣的邊界與劃界行動正是全球化時代矛盾的核心現場。於是，邊界的民主以及個體的自由就成爲關鍵，但這亦是另一層難解的矛盾。紀蕙老師坦承：

消解財產歸屬的主體以及社會主體之間的同一性，卻正是自由與平等的最大危機。共同體的膨脹凌駕於個人，或是個人財富的擴張凌駕於社群，二者都會造成自由與平等的問題。每一種矛盾的背後，卻又有另外一種的矛盾，例如社群背後的性別差異、或是勞動與資本背後的知性與身體勞動。此處便是巴里巴爾所指出的二律背反（*antinomy*）：革命的政治相對於建制的政治，換句話說，這是永遠不間斷的革命政治相對於建制秩序的國家政治。（ibid.: 328）

這就讓我們又回到了冷戰 / 劃界的邏輯裡：如果革命無法克服劃界的欲望，那麼革命的政治永遠會被建制秩序的國家政治所制約，也就無法擺脫共同體幻象所要求的邊界絕對化、實體化與神聖化。無產階級取得了政權，資產階級若不逃到海外孤島劃地爲國，或接受同一化約的治理邏輯與感知結構，讓「感情起了變化，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」，⁴就只能成爲新秩序中的無分之分。若是如此，邊界的民主化究竟該如何展開呢？

紀蕙老師主張：「邊界的民主化，並不是抹除邊界，而是在所有邊界處進行民主化，以介入性的翻譯與溝通，促成多邊的相互承認。」（ibid.: 325）而邊界的民主化除了依靠政治性的思辨與抗爭外，更有賴於「承認歷史流變與多重決定的偶然性」，以「解構單一法統一脈相承的論點」，使國家成爲「容納相續流注之人民的『空處』」，而非邊界明確而絕決的「領土」（ibid.: 410-412）。從西方而東方，從上古而當代，紀蕙老師的批判方案恰恰落在「解構國家，反思公共」這條軸線上，因爲理論的作用不在其虛玄抽象，而在於思想運動開展出來的解放力量，讓我們能夠對國家「在不疑處有疑」，挑戰其以符號暴力塗抹歷史，強行分裂人民的惡行。

4 這是〈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〉（1942）中，毛澤東對個人階級意識轉變的感性總結。

她強調：「只有承認並且面對國家作為符號場域的虛構性，我們才會觀察到其中發生的各種符號領域如何以抽象概念『一分為二』，劃分內外界線，進行主權爭奪之戰，進而立法鞏固既得利益，排除異己，並以各種體制法令進行統治的符號暴力。」（ibid.: 428）的確，臺灣現今的民主政治刻正進行的，正是這麼一種為了鞏固利益、排除異己的符號戰爭，但這也是當前最為流行，廣為接受的政治，並且是以多數暴力的民主形式所展現和執行的。那麼，邊界民主化的工程該怎麼展開呢？我們如何跳脫選票民主的對立框架，回復民主的動能，面對「民主」或許已然成為問題的現實呢？⁵

三、哲學考掘學：理論與方法

誠然，上述的現實問題必須在臺式民主的現實中來處置，但是思想作為現實的折射與對應或許仍可以提供一些思考的線索。在《一分為二》中，一條可能的線索就在於紀蕙老師方法論——哲學考掘學——裡。她寫道：

透過中國20世紀出現的政治哲學論爭事件的話語標記，探討可見事件背後不可見的政治經濟動力與錯綜脈絡，以及支撐這些脈絡的機構體制與政治範式。對於話語標記進行哲學考掘學，意味著不要將思想史脫離於物質社會與歷史脈絡，而要從各種思想的話語標記出發，探究時代脈絡的物質條件如何激發了主體的思維與感受，如何進一步促成教育體制與司法文化機構的形式，以及如何透過各種話語標記展現出書寫者的主體拓撲位置。（ibid.: 22）

因為「哲學考掘學的工作就是要推翻任何概念固定不變的起源說法，探討原初過程的痕跡，以便抵制超越歷史的唯心理念或是目的論」（ibid.: 30），所以她不只要把話語和概念放回歷史語境裡，更要討論歷史語境中發揮著作用的種種文化與政治機制，以及書寫者與之的應對關係，從而形成「話語－思想－體制－作者」的詮釋機制。在這個意義上，話語是流動變化的事件，體制是各地脈絡的載體，而作者則是不同位置與身分的表述

5 有趣的是，臺灣的主流民意時常擔心「民主失效」，反要以「鞏固民主」之名進行劃界排除。顯然民主只能是以公民身分為限，以投票行為來表達的制度。誠然民主的果實珍貴，但若民主（尊重主流民意）的表現造成了不民主（違反平等與自由原則）的結果，那麼這樣的民主又有何意義呢？

者。是故，值得追索的不只是「一分為二」從毛澤東到法國毛派與後結構主義思想家的跨國理論行旅，亦是華文語境中的體制變化與政治鬥爭，如何在「思想革命」與「思想僵化」的軸線上辯證和發展，並由之展開的政治性重構。這就解釋了為什麼紀蕙老師最後回到了章太炎，因為章太炎一代的學人身上承載了話語－思想－體制作用的痕跡，而成爲思想的轉軸。在紀蕙老師看來，章太炎的思想結合了釋道兩家而獲得了一個「緣起本體論」的歷史觀，因為「緣起」才是歷史的本體，所以彼我、公私的區辨只是時空的變量，不該被當成歷史的公理或常道之本體，而要破除名相之別，回到「指」與「物」的悖論，在歷史脈絡中去理解和區辨思想的發展，讓典籍和話語成爲指向生產脈絡、時代感受和是非判斷的印記和事件。

在這個意義上，曾經支持辛亥革命、發明「中華民國」一詞的章太炎對國家概念的理解和判斷，也就應該被視爲現代性國家話語的一個印記和事件，以幫助我們回想和思考現代國家概念在中國生成時的多元理念。比方說，紀蕙老師提醒我們，對章太炎來說，愛國「並不是愛其實體，而是愛其『組合』」，因爲作爲「器」的國家本身是虛幻的，但構成其「組合」的人民才是其本質（ibid.: 397）；而他屢次提出「革命軍起，革命黨消」，希望虛置中央政府的想法，也與「務虛」的歷史哲學體認相關。換言之，章太炎的批判性和基進性恰恰來自於他對「體」與「法」的不信任，亦即對國家虛構「實體化、絕對化、神聖化」的反彈與反抗。這從而提醒了我們，在現代性中，建國未必代表解放性政治的到來，國家其實才是解放性政治所要介入的場域。

在這個意義上，紀蕙老師的工作，雖然往歐陸與中國思想的深處前進，但其核心關切與1990年代初期《島嶼邊緣》展現的「去國族」思維相去並不太遠。差別在於，她最終回到了中國思想史的「綳摺」⁶之處，藉著「以名爲代」的索引方式，在中西思想的糾結中尋找解方，從而鬆動和批判了1990年代以來以認同政治爲名打造的臺灣國族主義，提醒我們那不過是「重疊交接處的標記 … 以分離又接合的方式，連結了一個不可見的複雜

6 「綳摺」一詞，援引自張小虹（2016）。

空間」，但它終究是「一個『空』」（ibid.: 30）。解放性政治的潛能在於從其空處找回那個「不可見的複雜空間」，重新認識與接合無分之分的「偏差」，使得主體本身也能夠進入批判自省的思想運動，而不致太快、太暴烈地封閉自身。哲學的考掘，因此，就涉及了歷史的再現與主體的重構。躲在冷戰 / 劃界底下的美好臺灣，或許也該面對民主的罔兩和闇黑了吧。

引用書目

- 백낙청 (白樂晴) 著，白永瑞、陳光興編 (edited by Baik Youngseo and Chen Kuan-Hsing)，朱玫、李政勳、林家瑄、苑英奕、孫海龍譯 (translated by Zhu, Mei, Li Zheng-Xun, Lin Jia-Xuan, Yuan Ying-Yi and Sun Hai-Long)。2010。《白樂晴：分斷體制·民族文學》*Baileqing: fenduantizhi · mingzuwenxue* [Paik Nak-Chung: Division System · National Literature]。臺北 (Taipei)：聯經 (Linking)。
- 백승욱 (白承旭) 著，延光錫 (연광석) 譯。2014 (2012)。《文革的政治與困境：陳伯達與造反的時代》(《중국 문화대혁명과 정치의 아포리아: 중앙문혁소조장 천보다와 '조반'의 시대》)。新竹 (Hsinchu)：交通大學出版社 (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Press)。
- 徐克飛 (Xu, Kefei)。2018。《東風西漸：《泰凱爾》知識分子的「中國夢」》*Dong feng xi jian: Taikaier zhishifenzi de "Zhongguo meng"* [Easternize the West: *Tel Quel* Intelligentsias "Chinese Dream"]。新加坡 (Singapore)：八方文化創作室 (Global Publishing)。
- 張小虹 (Chang, Hsiao-Hung)。2016。《時尚現代性》*Shishang xiandaixing* [Fashioning Modernity]。臺北 (Taipei)：聯經 (Linking)。
- 劉紀蕙 (Liu, Joyce Chi-Hui)。2000。〈前衛的推離與淨化〉“Qianwei de chouli yu jinghua” [The Abject and the Purgation in the Early Taiwanese Avant-Garde Movement in 1930s]，收錄於《書寫臺灣：文學史，後殖民與後現代》in *Shuxie taiwan: wenxueshi, houzhimin yu houxiandai* [Writing Taiwan: Literary History, Postcolonization and Postmodernity]，周英雄、劉紀蕙編 (edited by Chou Yingxung & Joyce Chi-Hui Liu)，頁141-167。臺北 (Taipei)：麥田 (Rye Field Publishing)。
- 。2020。《一分為二：現代中國政治思想的哲學考掘學》*Yifenwei'er: xiandai zhongguo zhengzhi sixiang de zhexue kaojuexue* [One Divides Into Two: A Topological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s]。臺北 (Taipei)：聯經 (Linking)。